臺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
2011 年 12 月，頁 51-96

BIBLID1012-8514(2011)48p.51-96
2011.3.28 收稿，2011.12.12 通過刊登

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
——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

羅　景　文*

提　要

東亞知識人究竟如何進行選擇、吸收、轉化、重組等一連串關於建構自身知識系統之思維活動，是饒富興味卻又不易處理的議題。本文試圖將焦點集中在近代中國及越南兩位重要的知識人——梁啟超（1873-1929）與潘佩珠（1867-1940），來觀察從梁啟超到潘佩珠所形成的「知識之流」中，某些「概念」的轉移變遷與重組再生。本文將探討他們對於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藉此理解東亞漢文化知識圈內知識傳遞與互動的樣態。

在這一場知識旅程裡，兩位知識人歷經了由西到東，從歐美與日本再到中國與越南的過程，吸納融混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並隨著現實處境的轉換更迭，展現出相應的面貌。這證明了東亞知識人與近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及文化思潮的多方交會與互動，在區域內呈現出複雜多元的互動關聯。相信這個例子，可以做為東亞知識人進出東亞知識渠道，以及東亞漢文化知識圈流動與互動的典型例證。

關鍵詞：東亞　知識人與知識圈　梁啟超　潘佩珠　再生產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701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E-mail: jiingwen123@pchome.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從梁啟超到潘佩珠的知識傳遞與流動
三、知識再生產：潘佩珠對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反饋
四、是「調適」還是「轉化」：潘佩珠與梁啟超不同的思想趨向
五、結語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東亞諸國都同樣得面臨西方政經局勢，乃至於文化思潮的強勢挑戰與威脅。在此之際，如何力求革新圖強、振衰起敝，以因應世／勢變之局，便是中國與東亞諸國的有志之士或知識分子重要的時代課題。接觸、學習，乃至於模仿西方得以強盛的近現代文明，是當時不少知識人的共識。日本在積極推動明治維新，大量吸收西方文明之後，成為東亞最早邁向近代化的國家，再加上本身蘭學（洋學）的傳統，使得日本成為東亞諸國知識人獲取西方思想資源的重要媒介，也吸引了東亞各國青年前往留學。[1]這些被稱為「西學」或「新學」的思想資源與概念，[2]往往透過日人的翻譯，再轉譯為中文，而在東亞各國之間傳

1 關於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狀況，可參見〔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北京：三聯書局，1983）；沈殿成，《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1896-1996》上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 92-280。至於日本明治維新對於越南的影響，以及越南青年赴日學習的過程，則可參見〔越〕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Quan Hệ Văn Hoá, Giáo Dục Việt Nam-Nhật Bản và 100 Năm Phong Trào Đông Du*（《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6）；〔越〕阮進力，*Minh Trị Duy Tân và Việt Nam*(《明治維新與越南》)(胡志明市：越南教育出版社，2010)。

2 「西學」與「新學」這兩個定義與範疇並不相同的詞彙時常連用或混用，甚至被視為同義的詞彙。不過，王先明認為「新學」是在中西會通基礎上形成的，與中國傳統舊學及西方事物和學術是全然不同的知識體系。在鴉片戰爭之後，「新學」一詞所指涉的意義也歷經了發展轉變的過程，詳見氏著，〈近代「新學」形成的歷史軌跡與時代特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播流通，並產生具體的影響。[3]

不過，知識的傳播並非僅限於單線傳授，只從西方傳播到日本，又從日本轉手至中國或其他東亞國家。除此之外，知識的接受也不是照單全收，而是依據各國自身的需要加以改造。已有論者指出：近代東亞知識轉型，在區域之內呈現複雜的互動關聯。[4]換言之，當時的思想世界已呈現多元思潮交流衝突的複雜面貌，新思潮、新知識的傳播與接受往往是東亞諸國不斷互動、多方激盪的結果，隨時有可能翻新出奇，幾番轉手之後亦可能已經「面目全非」。東亞知識人及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5]其間關係頗為糾葛複雜。然而，如何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對象，以理解／釐清知識人之間知識流動的複雜關係，卻又是另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

二十世紀前後，東亞知識圈的關鍵人物之一便是梁啟超（1873-1929），這位「言論界之驕子」透過辦報和譯介，成為東亞漢文化知識圈裡的重要人物。不少東亞知識人在建構其自身知識與概念系統時，常受到梁啟超程度不一的影響或「啟蒙」，進一步與東亞甚至世界思潮接軌。而近代越南民族運動的重要領袖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便受到以

《天津社會科學》2002 年第 1 期（天津），頁 118-124。

3 關於透過日本轉引大量的「思想資源」的情形，詳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 181-194。以及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 241-270。關於此時期中譯日書的情況，則可參考譚汝謙，〈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文，收入〔日〕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 57-63。

4 〔韓〕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識在東亞的傳播及其共同文本之探索〉，收入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79-116。並可參見徐興慶為該書所撰之〈導論〉，頁 vii-ix。

5 在東亞的範疇之中，同時存在著「漢字」與「非漢字」之文化圈，前者如中國、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後者如泰國、菲律賓等國。而本文行文中所使用的「東亞知識圈」一詞，主要是指共同分享漢字文化與儒家價值之東亞知識分子所形成的文化區域與知識群體，即「東亞漢文化知識圈」。此點承蒙審查人提醒，謹致謝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梁啟超為主之開明知識人的影響，藉由閱讀「新書」，繼而進入了東亞知識圈流動與互動的渠道之中，[6]成為進出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一分子。潘佩珠原名潘文珊，號巢南、是漢，為近代越南兼具民族運動者與文史學家之多棲身分的代表人物。1867 年生於義安省南壇縣，從小就接受儒學教育，並在三十四歲那一年（1900），獲鄉試解元，其父亦於同年 9 月辭世。在這一年，他除了得到傳統士人肯定的社會聲價之外，也放下了奉養父親的重責大任，因此他選擇走向與傳統士人不同的道路，開始聯繫全國各地愛國志士，進行實際的抗法活動，而於 1904 年 4 月成立「維新會」（Duy Tân Hội）。1905 年東渡日本，潘佩珠靈活地與在日中國知識人、革命者、留學生，以及日本政要建立關係，試圖爭取各種援助。他不斷往來於中、日、越三國，暗中從事革命活動，並鼓吹越南青年留學日本，在他與同志的苦心經營之下，1907 年留學日本的越南青年已突

6 有不少越南士人、知識分子也與潘佩珠一樣，透過「新書」而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接軌。「新書」指的是有別於儒家傳統舊學，而以介紹新學為主的書籍，包括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知識。這些「新書」主要由中國的知識分子（以梁啟超為主）翻譯日文書籍而來，以士人之間的借閱傳抄，及透過在越華僑商人購買而流通，以避免法國殖民政府的監控，相關討論可參見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98-100. 以及〔越〕張正，"Đôi Điều Khác Biệt giữa Các Nho Sĩ Trung Quốc với Các Nhà Nho Việt Nam Khi Tiếp Nhận Tân Thư"（〈中國與越南儒士在接受新書時的不同表現〉），收入〔越〕丁春林等主編，*Tân Thư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Cuối Thế Kỷ XIX Đầu Thế Kỷ XX*（《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1997），頁 184-187。正因為「新書」曾對越南社會及思想界造成重大影響，越南學界曾於 1997 年舉行「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研討會，並出版會議論文。該會議圍繞以下幾個主題：（1）新學輸入東方的過程與途徑；（2）中國譯著新書的士人與知識分子；（3）新學新書輸入越南的歷史背景；（4）新書對於越南維新及救國運動的影響；（5）新書對於越南愛國士人之影響。相關內容，詳見丁春林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一書。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到，潘佩珠閱讀這些從中國傳來的「新書」而獲得的啟蒙，如 William J. Duiker. "Phan Boi Cha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 (1971, Ann Arbor), pp. 78-79.〔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第三章第一節「『新書』との邂逅」，頁 130-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破二百人，此即越南近代史上重要的「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正當海外革命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之際，卻因法殖民政府的外交干涉，使得日本政府於 1909 年 2 月將潘佩珠與畿外侯彊柢（Cường Để, 1882-1951）驅逐出境，東遊運動就此告終。而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讓他又再度燃起希望，準備展開另一波的民族運動。1912 年 2 月，潘佩珠於廣州成立「越南光復會」（Việt Nam Quang Phục Hội）。1913 年 7 月，廣東都督龍濟光（1868-1925）在法東洋全權總督沙羅（Albert-Pierre Sarraut, 1872-1962）的要求之下，逮捕潘佩珠，直到 1917 年才獲釋。潘佩珠日後多以杭州為革命運動據點。潘氏於 1924 年解散光復會，仿效中國國民黨，成立「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卻於 1925 年 7 月 1 日為法國特務在上海車站北站所脅持，解送回國之後，法人將其軟禁於順化，直至 1940 年逝世。[7]

潘佩珠在東渡日本之後，不僅透過梁啟超的譯介，大量地吸收新學新知，更依據越南國情和自身論述的需要，重新建構、組織他所獲得的

7 目前學界對於潘佩珠生平事蹟的了解，主要依據其自撰之《潘佩珠年表》，然此書之抄、譯、注本甚多，書名（又名《自判》或《自批判》）和版本狀況頗為複雜。越南社會科學院史學研究所章收教授曾針對《潘佩珠年表》的名稱、來歷、創作時間、稿本、各種傳抄本及譯注本（含日法文），以及各版本之間的差異等問題，發表"Về Tác Phẩm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關於《潘佩珠年表》〉）一文，收入他所編輯的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潘佩珠全集》）（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第 6 冊，頁 81-101。根據他的看法，目前最早的漢文稿本收藏於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為其好友黃叔沆〔Huỳnh Thúc Kháng, 1876-1947〕舊藏），編號 Vhc.2138，此稿本未標明頁碼。而此稿本抄錄於另一漢文書之背面，較不易辨識。目前新發現另一早期漢文稿本，為武孟樸（Võ Mạnh Phác）藏本，武孟樸為潘佩珠次子潘宜第（Phan Nghi Đệ, 1894-1946）好友，於南越解放（1975）後將此書交還潘家。此書即據黃叔沆藏本重新謄錄，收入《潘佩珠全集》。以下所引《潘佩珠年表》即據漢喃研究所藏本，並參酌《潘佩珠全集》，為免註腳繁瑣，不一一註明。此外，關於《潘佩珠年表》之法、英、日等諸版本之介紹，亦可參見陳慶浩，〈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收入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7），頁 2。文中所言漢喃研究所藏本，編號「Vhc.1725」即編號「Vhc.2138」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想資源，而他的作品之後也成為東亞知識人可以援引取用的新概念來源。也就是說，潘佩珠在東亞漢文化知識圈裡，同時扮演知識的吸收者與傳播者之重要角色。中越兩位重要的意見領袖不僅有著深厚的情誼，在他們的身上也流貫著知識及思維的交流傳遞。兩人的地位，以及彼此之間的密切互動，在東亞知識人的知識流動過程中顯得獨樹一幟，正可做為探討東亞知識圈知識之流動與互動的例證。[8]

為了集中焦點，本文將聚焦於潘佩珠東渡日本前後，其觀念與思維的形成過程，以及梁啟超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力。而潘佩珠在得到思想的刺激、視野的開拓之後，又如何依據越南民族運動的現實處境，來運用其所吸收的概念，著書立說、宣傳啟蒙，並與其他知識人一同參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構築？而與梁啟超相較，潘氏又呈現怎樣的特色與面貌？以上諸項，是歷來研究者在探討越南知識人與東亞知識圈之互動時，較少處理的問題與面向。[9]此一議題的討論，亦有助於了解潘佩珠及

8 梁、潘兩人的交遊與互動，是學界研究潘佩珠的焦點之一。潘佩珠所領導的「東遊運動」正是出自於梁啟超的建議。相關論述，舉其要者如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pp. 108-115;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頁 307-321；〔越〕吳雪蘭，〈潘佩珠與梁啟超及孫中山的關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6 期（北京），頁 135-141；〔越〕范鴻崧，“Về Các Cuộc Gặp Gỡ giữa Phan Bội Châu và Lương Khải Siêu và Sự Khởi Phát của Phong Trào Đông Du”（〈關於潘佩珠與梁啟超的會晤，以及對東遊運動的啟發〉），收入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頁 416-428。上述諸作大都集中於梁啟超對於潘佩珠政治活動的影響，相較之下，對於梁、潘兩人思想之間的互動，以及梁對潘在抵日前後這一段時間之思維活動的影響，仍有開拓的空間。

9 除了註 9 所引諸作之外，又如〔越〕阮伯成，“Dấu Vết Tân Thư trong Tác Phẩm của Phan Bội Châu”（〈「新書」在潘佩珠作品中的痕跡〉），收入丁春林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頁 494-504。此文提到潘佩珠透過新書吸收到革命、民主、社會主義，甚至是現代科學等思想，使得他的愛國和革命思想得到新的發展，「愛國」、「合群」比儒家所強調的「忠君」更為重要。〔日〕今井昭夫，“Thời Kỳ Hoạt Động ở Nhật và Hình Thành 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潘佩珠在日活動及其思想形成過程〉），收入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頁 337-353。此文討論潘佩珠是否受到陽明學影響，以及他根據那一部著作來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作品與近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及文化思潮等多方交會、互動的情形。不過，潘佩珠所吸收的思想多元繁複，為方便探討此課題，筆者將選擇同樣作為梁、潘兩人之思想資源的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為討論對象，觀察這些「概念」或「符號」被接收建構、移轉變遷的情形，即它們傳播到潘佩珠手中的途徑與過程，以及他日後汲引運用之「再生產」的內容與狀況，以理解從梁啟超到潘佩珠，東亞知識圈所歷經的流動與互動之樣態。[10]

二、從梁啟超到潘佩珠的知識傳遞與流動

在前往日本以前，潘佩珠是如何吸收新知、新學，以儲備認識世界局勢的知識？根據他的自傳，我們可以知道越南當時的重要士人阮尚賢

究社會主義等兩個問題。又如阮進力《明治維新與越南》一書也提到明治維新對潘佩珠的影響，如提倡貿易通商、立憲政治，並試圖以日本維新為模型建立「新越南」，見頁 259-263。簡而言之，關於潘佩珠（及其他越南知識分子）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接觸互動的探討，大都偏向於結果論，以及政治活動方面的影響，而較少探討某些思想或概念傳播、接受的途徑與歷程，以及彼此之間的不同樣貌。

10 在此之前，筆者曾與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合撰〈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一文，宣讀於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辦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和漢字文化圈國家（越南、中國、韓國）的文學現代化進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3 月 18-19 日），會議全文詳見：http://khoavanhoc-ngonngu.edu.vn/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58%3A2010-03-12-13-12-39&catid=85%3Ahi-tho-qua-trinh-hin-i-hoa-vn-hc&Itemid=147&lang=vi（2011 年 11 月 20 日讀取）。後發表於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學刊》第 1 期（2010，吉隆坡），頁 119-141。該文試圖觀察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瑪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的書寫，來分析潘佩珠之作品與中國、日本的關係，文中雖已觸及潘佩珠與梁啟超的互動關係，但尚未深入探討梁啟超對於潘佩珠參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引導作用和影響程度，以及兩人對於相同人物的不同看法，甚至是思想上的差異。因此，筆者繼而撰寫本文，嘗試以不同的切入點，觀察梁潘兩人對於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進一步發掘潘佩珠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互動的豐富意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1868-1925）曾借他「《中東戰紀》、《瀛寰志略》、《普法戰紀》等書，予因略曉寰海競爭之情狀，國亡種滅之慘，益大有激刺」。[11]而潘佩珠自身也「曾得讀《戊戌政變記》、《中國魂》及《新民叢報》兩三篇，皆為梁啟超所著者」（《潘佩珠年表》）。[12]雖然這只是潘佩珠開眼看世界的起點，但他的經驗是許多越南知識分子接受外來思潮與局勢變化的縮影，這些「新書」已成為越南士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共同書單，或是案頭必備的參考書。[13]而隨著新學新書的蓬勃發展，越南知識／學術典藏系統也建立相應的分類體系，編纂專門的目錄，這一知識系統得到了重視與強化，[14]證明在越南士人的知識領域裡，新學新

11 阮尚賢，字鼎南，號梅山，河西省人，曾任國史館修纂、南定省督學，1907 年因法廢成泰帝（Thành Thái, 1879-1954, 1889-1907 在位），而棄官抗議。1908 年出洋，投入海外抗法殖民運動，參與潘佩珠所領導的東遊運動與越南光復會等活動。辛亥革命之前，阮尚賢至山西，想爭取山西巡撫陸鍾琦（1848-1911）的支持（阮尚賢與陸鍾琦之子陸光熙於日本結識），但陸氏父子因山西起義而慘遭滅門。辛亥革命之後，阮尚賢擔任《并州日報》主筆，並與在晉友人往還唱酬。歐戰之際，阮氏至暹羅與德奧公使聯繫，欲利用德奧與法之間的矛盾抗法。而最遲在潘佩珠 1917 年出獄之前，阮尚賢已居於杭州。然而，當阮氏得知法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時，心灰意冷，遂栖身於杭州佛寺，1925 年 12 月 28 日逝於杭州雲居山常寂光寺。阮氏著有《桑海淚塵》、《南枝集》（1925 年鉛印本）。《桑海淚塵》作者署名「交趾客」，初刊於《雲南雜誌》第 20 號（1910 年 8 月），後收入楊南邨編，《世界亡國稗史》（上海：交通圖書館，1917）。關於阮尚賢之生平，詳見師道剛，〈辛亥革命前后越南志士阮尚賢旅晉史實鉤沉〉，《山西大學學報》1982 年第 1 期（太原），頁 98-107 轉 72。〔越〕章收編，*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Tuyển Tập Thơ Văn*（《阮尚賢詩文選集》）（河內：勞動出版社，2004），頁 9-10。

12 而在潘佩珠寄給梁啟超的〈上知己書〉裡，則提到他也讀過梁所著的《自由書》。見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96。

13 如越南另一位愛國志士黃叔沆的閱讀清單裡，也同樣有《中國魂》、《戊戌政變記》以及《新民叢報》等著作，此外尚有《日本維新三十年史》，見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頁 134。

14 越南阮朝成泰十四年（1902）聚奎書院重編《聚奎書院總目冊》（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 111），分為經、史、子、集、西洋書五部，「西洋書」共收錄 70 部 96 本漢譯西書。又如新書院於維新六年（1912）編《新書院守冊》，現存 1914 年抄本，分為經、史、子、集、國書、西書等六庫，《新書院守冊・西書庫》目錄（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 2645）共收錄了 99 部 462 本漢譯西書。附帶一提，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已經是非常熱門的議題。而其中可供我們觀察東亞知識圈知識傳遞與流動的線索，是潘佩珠認識與理解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途徑與過程。

不過，潘佩珠並沒有在他的「閱讀清單」裡提及任何對西方思想家或日本維新人物的認識和理解。目前所知的唯一線索，是潘佩珠到日本之後，才真正接觸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及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思想與著作：

> 予自到日本後，歷究外國革命原因及政體之優劣，又心醉於盧梭、孟德斯鳩（盧梭《民約》、孟德斯鳩《法意》等書，予皆出洋後始見之）。（《潘佩珠年表》，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早在潘佩珠 1905 年到達日本之前，盧梭與孟德斯鳩已經是當時中日思想界的熱門議題與流行話語。大約在 1880 年前後，盧梭的事蹟與思想正式進入了中日兩國的知識視野，如 1878 年郭嵩燾（1818-1891）《倫敦與巴黎日記》、1879 年日人高橋二郎（1850-1917）《法蘭西志》與岡本監輔（1839-1904）《萬國史記》、1882 年美國傳教士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 1841-1913）《萬國通鑑》、1885 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所譯《泰西新史攬要》，以及 1890 年王韜《重訂法國志略》等書中，都記錄或描述了盧梭的言行，並簡要介紹其思想和影響，但這些著作提供的仍是片斷式的思想資源。此時盧梭的形象雖未明顯變形，卻已逐漸走向眾聲喧嘩的境地。[15]

（北京：中華書局，2007）一書引《大南實錄》，誤將《聚奎書院總目冊》的成書時間定為嗣德九年（1856），見劉書頁 176-177。

15 關於盧梭思想在中日兩國的傳播及其形象演變，學界論述甚多，舉其要者，如鄭永福，〈盧梭民權學說與晚清思想界〉，《中州學刊》1985 年第 4 期（鄭州），頁 110-113；〔法〕瑪麗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辛亥革命前盧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收入劉宗緒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頁 55-63；鄒振環，〈《民約論》在中國的傳播〉，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頁 134-139；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在中日兩國「盧梭接受史」上的重要大事，就是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於 1882 年開始在《歐美政理叢談》上連載其翻譯盧梭《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 1762）的《民約譯解》，並於同年 10 月出版。雖然只是節譯，卻因為中江本人較能掌握盧梭思想的精義，並能結合當時日本的實際狀況加以闡發，加上譯筆生動流暢，此書一出，便成為影響最大的譯本。中江兆民也因此獲得「東洋盧梭」之譽。[16] 1898 年，中國出版第一部關於盧梭的譯作《民約通義》，便是譯自中江兆民《民約譯解》而來。此後，關於盧梭的譯作及專論越來越多，1901 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盧梭學案〉，[17] 1902 年留日學生楊廷棟則據原田潛譯本翻譯出版《路索民約論》。[18]繼而又有柳亞子（1887-1958）

憲明、舒文，〈近代中國人對盧梭的解釋〉，《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北京），頁 16-33；夏良才，〈《民約論》在中國的傳播〉、〈孫中山、梁啟超和《民約論》〉，皆收入黃德偉編，《盧梭在中國》（香港：香港大學，1997），頁 82-87、165-171；李瑋，〈盧梭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收入氏著，《盧梭》（臺北：婦女與生活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217-251；吳雅凌，〈盧梭思想東漸要事匯編〉，《現代哲學》2005 年第 3 期（廣州），頁 39-43、57；〔日〕川尻文彥，〈清末中國接受《社會契約論》之諸相〉，收入〔韓〕崔博光主編，《東北亞近代文化交流關係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頁 81-104；吳雅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漢譯及其影響〉，《現代哲學》2009 年第 3 期（廣州），頁 84-93。除此之外，袁賀、談火生選編，《百年盧梭——盧梭在中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一書，收錄上述部分作品，亦可參看。筆者關於「盧梭」在中日兩國接受史的討論，主要參考上述諸作，下文不一一贅引。

16 〔日〕飛鳥井雅道，《中江兆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 151-157。畢小輝，《中江兆民》（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18-19。在中江兆民譯著盧梭《社會契約論》之前，已有 1878 年服部德的譯作《民約論》，後來又有原田潛於 1883 年翻譯出版的《民約論覆義》，但兩者影響均不如中江譯本來得大，其譯作水準亦不如中江之作。關於後兩種譯作的討論，詳見〔日〕飯島幸夫，〈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契約論』の翻訳について〉（2005 年 9 月），網址：http://www15.ocn.ne.jp/~iijima/discours/newpage6.html（2010 年 9 月 9 日讀取）。

17 該文原於《清議報》1901 年第 98-100 期連載，後改題為〈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轉載於《新民叢報》1902 年第 11-12 號。收入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97-110。

18 連載於《譯書匯編》第 1、2、4、9 期（1900 年 12 月-1901 年 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歌〉（1903）、鄒容（1885-1905）《革命軍》（1903）、王國維（1877-1927）〈法國教育大家盧梭傳〉（1904）、懷仁《盧梭魂》（1905）等眾多作品接踵而至。經過這些著作的讚揚與謳歌，盧梭已被神化／異化，而成為救國存亡之「靈藥」與「寶方」。[19]在這些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此時的盧梭已經展現出強大且誇張的符號功能，離原本的形象也越來越遙遠。

孟德斯鳩則比盧梭略早一些進入中國人的知識視野，早在 1864 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所譯的《萬國公法》裡，就已經提到孟德斯鳩及其代表作《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隨後許多介紹盧梭的著作，多半也會提到孟德斯鳩，兩人可謂是當時中日知識分子汲引法國政治思想的「雙子星」。又如 1879 年高橋二郎《法蘭西志》與岡本監輔《萬國史記》、1882 年謝衛樓《萬國通鑑》、1885 年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攬要》，以及 1890 年王韜《重訂法國志略》等作，都提到孟德斯鳩言行及其思想片斷。此時孟、盧兩人在中日兩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已頗具知名度。[20]

梁啟超也同樣扮演了引介孟氏思想的傳播者角色，1899 年於《清議報》上發表〈蒙的斯鳩之學說〉，繼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1902）一文，給予孟德斯鳩及其思想極高的評價。[21]之後陸續有《譯書匯編》、《國民報》、《湖北學生界》、《浙江潮》

19 鄒容《革命軍》：「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體，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盧梭及其思想，至此已被吹捧到無以復加的地位。上述引文，見鄒志選注，《猛回頭——陳天華、鄒容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 184-185。

20 關於孟德斯鳩在中日兩國接受情形的討論，筆者主要參考許明龍，〈孟德斯鳩的著作與中國〉、〈孟德斯鳩在辛亥革命前對中國的影響〉，收入氏著，《孟德斯鳩與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106-142。侯鴻勳，《孟德斯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51-258。鄒振環，〈《法意》與傳入中國的「三權分立」學說〉，《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頁 139-145。下文不一一贅引。

21 兩篇文章基本內容相同，後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刊物譯介孟德斯鳩的學說。其中較為完整的兩個譯作，是 1901 年由張相文（1866-1933）據日人何禮之（1840-1923）譯本翻譯而成的《萬法精理》，以及由嚴復於 1900 年據英譯本開始翻譯之《法意》，該書 1904 年之後陸續出版，至 1909 年脫稿。較之盧梭，孟德斯鳩所展現的傳播效應亦不遑多讓。[22]

以上所述，是 1905 年潘佩珠到達日本之前，兩位西方思想家及其思想在中日兩國的傳播／接受狀況，顯見當時思想市場上的熱鬧景象。而在眾聲喧嘩、琳琅滿目的思想市場上，潘佩珠究竟是如何選擇、吸收這兩位西方思想家的事蹟與思想，進行自身的思想／知識旅程？他並沒有在自傳或是其他著作裡，交代他知悉或閱讀盧、孟兩人言行思想的來源或途徑。雖是如此，我們仍可以透過一些蛛絲馬跡追尋他的知識建構之旅，而這其中的關鍵便與梁啟超有關。

首先，潘佩珠早年的閱讀經驗與梁啟超有密切的關係。早在潘佩珠曾讀過的《中國魂》與《自由書》裡，其實已經可以見到梁啟超對盧、孟兩人言論思想的評介，《自由書》甚至還收錄專文〈蒙的斯鳩之學說〉。潘佩珠有可能已經初步認識或略聞盧、孟兩人之名，只是未曾留心注意。直到出洋之後，潘佩珠才能不受法國殖民的箝制監控，自由地閱讀兩人

之十三，頁 18-29。梁氏在文中盛讚孟德斯鳩：「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斯鳩當之。」又云：「此書（按：指《法意》）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為之丕變，真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勢。」引文見頁 18、19。

22 另一個可供觀察的角度，是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的編纂狀況。夏曉虹曾以「孟德斯鳩」為例，觀察幾部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的編纂過程與建構知識系統之方式，她發現早期的辭典（其實尚不能稱為「辭典」）由於譯名歧異紛亂（如蒙的斯鳩、蒙特斯邱），所以常有人物重出的現象，而且各條之間對傳主的敘述也各有側重，甚至是矛盾的地方，顯見編者未必熟悉傳主事蹟，甚至是一無所知。後期的辭典則因譯本的增多，開始出現規範化的人名，而且編者翻譯編纂時也較為用心。值得注意的是，聲勢較孟德斯鳩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盧梭，卻被晚清士子編入「附考」之中，而不得入於正文。原因在於盧梭思想可能會引起革命，所謂「亂黨之導火線」、「恐開犯上作亂之端」。此一心態，亦值得玩味。詳見夏曉虹，〈從《尚友錄》到《名人傳略》——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研究〉，收入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著作，醉心於兩人的學說。當時，梁啟超的作品帶給潘佩珠的震撼，並非在於知曉盧梭、孟德斯鳩之事，而是他那具豐沛情感、磅礴氣勢之筆鋒所帶來的知識刺激與思想撞擊。潘佩珠曾在〈上知己書〉裡提到：「讀《中國魂》、《自由書》等作，不知手何以忽舞，足何以忽踴，精神志氣何以忽狂揚欲飛。」[23]由此看來，潘佩珠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也被「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那鋒利感人的筆鋒所吸引。[24]因此，潘佩珠「極敬慕其人」，「擬一到日本，則先謁梁」（《潘佩珠年表》）。他在求謁梁啟超的信中寫到：「落地一聲哭，即已相知；讀書十年眼，遂成通家。」[25]彷彿生來就是梁啟超的知音，並在長期的閱讀之中，跨越了語言、地域的障隔，與梁啟超成為精神相契的好友。雖然說這不無誇飾的成分，但也讓我們看到梁啟超的著作的確成為潘佩珠重要的閱讀對象與精神糧食，提供較他人更有影響力的思想資源。

其次，潘佩珠抵日初期與梁啟超有著緊密的接觸聯繫。潘佩珠求謁之後，立即獲得梁啟超的接見。而其求見梁啟超的目的，在於請教他有關越南救亡圖存、脫離法國殖民的行動對策與方針，並希望透過梁之協助，與日本政界建立關係，進而請求外交和軍事上的支持。在梁啟超的居中牽線之下，潘佩珠得以建立與日本政界如大隈重信、犬養毅等人聯繫的人脈。雖然潘佩珠未能得到日本政界在外交及軍事上的支援，卻得到梁啟超許多的協助與建議。[26]舉例來說，在他的幫助之下，潘佩珠完

23 〔越〕潘佩珠，〈上知己書〉，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96。

24 關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於梁啟超及其文章和思想的接受與迴響，詳見司馬長風，〈梁啟超的「新民運動」〉（上、下），《南北極》112-113 期（1979，香港），頁 71-75、52-55。

25 梁啟超，〈記越南亡人之言〉，《新民叢報》第 67 號（1905 年 4 月），後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自由書》，頁 105-110。這是他和潘佩珠前兩次會晤的紀錄。而這兩句話也在潘佩珠的兩部自傳《獄中書》與《潘佩珠年表》，以及〈上知己書〉裡出現，可見潘佩珠對會見梁啟超一事的重視，以及對梁氏的敬慕。

26 梁啟超當時建議潘佩珠：「予殫竭心慮，現時只有二策為能貢獻於公者。其一多以劇烈悲痛之文字，摹寫貴國淪亡之病狀，與法人滅人國種之毒謀，宣布於世界，或能喚起世界之輿論，為君等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國，或以文書寄回國內，鼓動多數青年出洋遊學，藉為興民氣、開民智之基礎，又一策也。」潘佩珠聽完梁的建議之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了生平第一本被出版的著作——《越南亡國史》，這本書對內可以喚醒民族情感、激勵同胞抗法，對外則成為引起國際輿論的最佳宣傳品。而在建言獻策之外，梁氏也提供自身著作或是其他圖書供潘佩珠閱讀：

> 初予訪梁公時，公方修〈意大利三傑傳〉，出以示予。予極慕瑪志尼之為人，而瑪傳中「教育與暴動並行」一言，尤予所心醉。是故，一方面鼓動學生出洋；又一方面，勵國人以革命之思想與其行動。（《潘佩珠年表》）

潘佩珠閱讀〈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後，[27]極為仰慕瑪志尼之為人與愛國精神，並借鑑瑪志尼的革命經驗，將教育宣傳與軍事武裝作為未來從事越南民族運動的兩大行動策略，[28]其中又以武裝暴動更能吸引潘佩珠的注意，[29]足見此傳的影響。而梁啟超又大方地借閱藏書，這對初抵日本、

云：「予此時腦界限界為之豁然，深悟從前思想及所經營，皆孟浪荒唐，無足取者。」見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Vhc. 2138）。

27 梁啟超所撰之〈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大部分是根據平田久（1872-1923）編譯的《伊太利建國三傑》（日本民友社 1892 年版）與松村介石（1859-1939）的〈嘉米祿・加富爾〉（《太陽》第 4 卷第 1-2 號〔1898 年 1-2 月〕），並參考其他書籍補充而成的。見〔日〕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入〔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52-264。

28 受到瑪志尼的影響，潘佩珠在進行組織規劃時，便將其分為兩類：「一為和平派，專注於學堂演說宣傳等事；一為激烈派，專注於運動軍事，籌備武裝實行之舉動。」（《潘佩珠年表》）

29 潘佩珠主張武裝暴動革命的理念，這是受到越南自古以來武裝抵抗外敵的傳統、法殖民殘暴的統治方式、潘佩珠自身任俠尚武的性格，以及武裝革命之歷史人物的啟發等諸項因素影響。學界對於潘佩珠的「暴動」主張亦有相關討論，如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下），《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 年第 3 期（廣州），「暴力革命思想的消長」，頁 39-40。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第四章第一節「武力革命路線」，頁 147-153。又如〔越〕楊庭立，"Chủ Trương 'Bạo Độ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trong Phong Trào Yêu Nước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在抗法鬥爭愛國運動之中，潘佩珠的「暴動」主張〉），收入河內國家大學、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編，*Phan Bội Châu：Con Người và Sự Nghiệp*（《潘佩珠其人及其事業》）（河內：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1998），頁 52-61。但此文主要探討潘氏實行「暴動」行動的過程，對於其思想的形成討論甚少。潘佩珠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活困頓又不諳日語的潘佩珠而言，[30]是極其重要的精神糧食。[31]因此，我們可說梁啟超是對潘佩珠在出洋前後這一段時間裡，影響最大的知識人。除了有形的物質援助，梁啟超也成為潘佩珠在日初期重要的思想資源的供應者，影響他的知識建構與形成。潘佩珠對於盧梭及孟德斯鳩的理解，便可能來自梁啟超的譯介。[32]

然而，我們不可忽略的是，梁啟超受到日本明治文化，以及經日本改造而含融其中之西方文化很大的影響。他在日期間大量汲取日本思想家的言論，以介紹西方或日本過去或是當下流行的思潮。這不僅提供他

暴動思想究竟如何建構成形，與越南民族傳統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付諸實踐等諸問題，仍值得再思考討論。

30 潘佩珠曾數次在《潘佩珠年表》裡提到外語對他的限制，如剛至日本，他說：「所最苦者，日語既不通，而華語又不甚曉，筆談手語煩累滋多，實外交家之奇恥也。」1910 年，他讓青年林德茂（Lâm Đức Mậu，生卒年不詳）進入中德中學校就讀，因「予夙有遊歷柏林之希望，以通譯無人，旅資亦窘，遊歐計遲未成，至是得林君實空谷之足音矣」。潘佩珠出獄後到北京，則透過黃廷珣（Hoàng Đình Tuân, 1894?-1923）之翻譯，與德法外交官往來，「予屢訪談，皆以君為舌人」。潘佩珠會晤俄國外交官時，俄人提出「君能著一書，用英文詳述法人在越之真相，則以贈我，我當感謝不忘」之要求，然潘佩珠自承「惜予不能為英文，無以應也」。由於外語的限制，漢字成為他唯一能與中日知識人溝通的工具，因此在新學新知的吸收上，更大程度地依賴梁啟超等中國知識分子的著作。

31 潘佩珠曾描述其窘境云：「予等九人，日惟粗米二餐，食品僅鹽一盒、茶數杯。小屋僦居，相依為命。時為孟冬，雪落如雨，寒風刺骨，手足皆僵。而予等初出境時，毫無禦冬計，單衣薄飯，力攻饑寒。幸梁處藏書甚多，朝夕借覽，頗足自遣。」（《潘佩珠年表》）

32 越南學界亦肯定西方啟蒙思想，如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對越南社會及維新運動有所影響，如〔越〕阮長歷，“Từ Nguồi Gốc Tư Tưởng Khai Sáng ở Phương Tây đến Tư Tưởng Duy Tân trogn Tân Thư ở Trung Quốc và Việt Nam”（〈從西方啟蒙思想到中國和越南「新書」的維新思想〉），收入丁春林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頁 213-218。然就筆者目前所見，唯一專以討論盧梭、孟德斯鳩思想的論文是〔越〕黃清澹，“Từ Tinh Thần Phát Luật của Môngtexkiơ đến Khế Ước Xã Hội của Rútxô”（〈從孟德斯鳩的《法意》到盧梭的《社會契約》〉），亦收入《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頁 219-227。不過，該文僅討論兩位思想家政治思想的異同，並未討論其思想對越南知識分子的影響，及其成為「思想資源」與傳播接收的途徑與情形。這個議題仍值得繼續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取用的「思想資源」與「言論武器」，也對他日後思想的塑模成形有著決定性的作用，[33]梁氏正是透過日人的譯介之作，來認識盧梭和孟德斯鳩的。而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梁氏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發表一連串介紹西方思想家言行思想的文章，大部分內容是根據中江兆民《理學沿革史》（1886）而來。[34]但實際上，中江兆民《理學沿革史》又是以 Alfred Jules Émile Fouillée（1838-1912）的《理學沿革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1875）為藍本。[35]由此可見，知識／思想引介傳遞的複雜性，正如狹間直樹所言：「西洋、日本、中國這幾個層次（或者說板塊、要素）並不是整齊劃一地迭加著，而是非均衡地相互嵌合著的。」[36]也就是說，知識／思想的傳播引進是隨著實際情形的差異，既有承襲，亦有創新，展現出多元複雜的類型與面貌。[37]這個經驗也提醒著研究者，

33 關於梁啟超與明治文化的關係，以及透過日本轉介西方文化思潮的過程，學界論述甚多，主要可參見〔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其餘單篇散論，此不贅述。

34 相關討論詳見〔日〕宮村治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學」との關聯において〉，收入氏著，《開国経験の思想史：兆民と時代精神》（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頁 229-257；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151-153。

35 梁啟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提到：「康德學說，條理繁賾，意義幽邃，各國碩學譯之，猶以為難，況淺學如余者。茲篇據日人中江篤介所譯阿勿雷托之《理學沿革史》為藍本，復參考英人、東人所著書十餘種彙譯而成。」中江兆民受日本教育部委托，將此書譯成日文，他採用的版本是 1879 年第 2 版。「阿勿雷托」即 Alfred Jules Émile Fouillée，關於 Alfred 及其《理學沿革史》的介紹，詳見瑪麗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盧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收入劉宗緒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頁 58-59；宮村治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學」との關聯において〉，收入氏著，《開国経験の思想史：兆民と時代精神》，頁 236-237。

36 〔日〕狹間直樹撰，張玉林譯，〈梁啟超研究與「日本」〉，《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4 期（1997，臺北），頁 53。

37 梁啟超在譯介時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因此每一篇譯作之中，受到影響的外在因素，以及其思想建構與流動的情形也不盡相同。黃克武曾透過梁啟超對中江兆民譯作中關於「康德」部分的翻譯與解讀，思考上述問題。他認為狹間直樹所謂作為「中間環節」的「『日本化』了的西洋的存在」，有時是深刻地影響梁啟超思想的取向，有時卻只是支離破碎的片段，提供梁氏思想發揮的素材，有時則是居於兩者之間。如何進一步釐清不同的「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進行東亞知識人的知識／思想建構之考索時，應先抉發、廓清各種因素的影響，繼而進行相關的研究，才能避免「將他的言行過分地描述為一個主體性的個人的問題」的謬誤。[38]

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不僅是潘佩珠，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知識人來說，梁啟超在東亞漢文化的知識流動渠道裡，無庸置疑地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除了西方思想家如盧梭、孟德斯鳩兩人之外，潘氏筆下最常出現的日本維新人物與思想家分別是西鄉隆盛（1828-1877）、吉田松陰（1830-1859）及福澤諭吉（1835-1901）三人。不過，潘佩珠並未提供他認識這些人物事蹟的線索與途徑。[39]然而，揆諸潘佩珠對盧梭、孟德斯鳩的認識過程之後，我們相信潘佩珠對

合」方式而認識到其思想的複雜面貌，將是未來梁啟超研究所面臨的重要課題。詳見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0 期（1997，臺北），頁 101-148。

38 語出狹間直樹，〈日文本序〉，《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頁 6。試舉一例，顏德如試圖比較梁啟超對盧梭《社會契約論》之解讀的誤讀狀況，但卻直接以梁譯《盧梭學案》與原著對讀，而完全忽略了法文本與日譯本的中介影響，使得梁氏對盧梭思想的誤解都來自於他那「個人的問題」。詳見顏德如，〈理解的可能，《盧梭學案》與《社會契約論》之比較〉，收入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302-334。

39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潘佩珠對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以及彼此之間政治觀念的差異。如永聘認為潘佩珠在國家獨立的觀念上與福澤諭吉有很大的差異，前者主張合群、暴動，以及訴求亞洲聯合（泛亞論）；而後者則強調個人的獨立、追求文明，並且提出「脫亞論」。參見〔越〕Vĩnh Sính（永聘）, “Phan Bội Châu and Fukuzawa Yukichi（福澤諭吉）: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Dông-Du Movement*, ed. Vĩnh Sính (New Haven: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88), pp. 101-149. 後復以越文發表於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歷史研究》）265 期（1997，河內），頁 17-34。又如阮進力摘錄潘佩珠有關吉田松陰與西鄉隆盛的論述，介紹兩人的生平，以及他們被潘佩珠書寫的原因。參見阮進力，“Phan Bội Châu Viết về Vác Nhà Lãnh Đạo Công Cuộc Duy Tân ở Nhật Bản: Yoshida Shoin và Saigo Takamori”（〈潘佩珠對於日本維新事業領導者的書寫——吉田松陰與西鄉隆盛〉），收入氏著，《明治維新與越南》，頁 269-281。永聘與阮進力都注意到潘佩珠與日本維新者的關連，但甚少著墨於潘佩珠吸收這些思想或概念的歷程與途徑，並進一步比較在特定時空之下，東亞知識人的思想選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日本維新人物的認識與理解，也很可能來自梁啟超的引介。

進一步追尋梁啟超的閱讀經驗，我們可以發現早在他到日本之前，便已留心日本維新的發展情形及相關人物的事蹟。他最早接觸的人物應該是幕末志士吉田松陰，透過康有為（1858-1927）教授《幽室文稿》一書，吉田松陰慷慨獻身、任俠勇毅的形象，早已在梁的腦海裡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40]他也透過蒲生重章（1833-1901）《近世偉人傳》（1877）、岡千仞（1833-1914）的《尊攘紀事》（1882），[41]以及黃遵憲（1848-1905）《日本國志》（1895）獲知日本幕末士人與維新人物的言行事蹟。透過這些著作，相信他對這些人物應該不陌生。

到了日本之後，梁啟超憑藉日籍之力，得以刺激思想、開拓視野，他說：

> 既旅日本數月，肆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42]

又說：「自東居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40 梁啟超〈上品川彌二郎子爵書〉曾回憶云：「啟超昔在震旦，遊於南海康先生之門，南海之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士氣稍有衰弱，輒讀此書，勝於暮鼓晨鐘也。』僕既受此書，因日與松陰先生相對晤。而並與閣下相晤對者，數年於茲矣。」按：因品川彌二郎（1843-1900）是吉田松陰「松下村塾」的弟子，而品川正是《幽室文稿》的編者，故梁氏有此言。引文見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6。

41 梁啟超〈記東俠〉云：「余讀岡千仞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者，言論丰采，一一若在耳目。」並在文中提到西鄉隆盛、吉田松陰、佐久間象山（1811-1864）、清川八郎（1830-1863）、伊牟田尚平（1832-1868）、中山忠愛（1832-1882）、平野國臣（1828-1864）、真木保臣（1813-1864）、小河一敏（1813-1886）、大久保利通（1830-1878）、田中河內介（1815-1862）等幕末志士。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頁 28-31。上述引文見頁 28。

42 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1899），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頁 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與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43]西方及日本新學知識流動的轉進與輸出，不僅讓梁啟超得到立言論說、擘畫思索的「思想資源」與「言論武器」，得以建立起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系統，也讓這位「言論界之驕子」有一展身手的空間，成為東亞知識人接受新思潮的領航員。他大量閱讀關於吉田松陰的著述，甚至因為景仰其人而改名為「吉田晉」，[44]對於吉田松陰的仰慕，可謂無時或已。然而，梁啟超並沒有交代他在日本讀到的是何種版本的吉田松陰傳記，但極有可能是德富蘇峰（1863-1957）所著《吉田松陰》（1893）一書。因為德富蘇峰「雄放雋快」的文風曾深深地吸引著梁啟超，[45]而且，對他來說，這本書的難度也不會太高，日後成為他書寫人物傳記的模範。[46]後來，梁啟超將他對吉田的欽慕化為實際行動，親自編輯《松陰文鈔》，以激勵當時的士人學習吉田松陰的精神。往後，梁啟超也多次在作品裡「召喚」吉田松陰，作為自己立論言說的基礎與依據。[47]

---

43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又名〈汗漫錄〉，1899），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頁 186。

44 梁啟超〈上品川彌二郎子爵書〉：「松陰先生著述及行狀，尚有他刻否？能惠賜一二種，不勝大幸。」又云：「超因景仰松陰、東行（按：高杉晉作，1839-1867）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此信寫於 1898 年 9 月 20 日，見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頁 56。

45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云：「讀德富蘇峰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談》數種。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蘇峰在日本鼓吹平民革命，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頁 191。

46 除了文體之模仿外，梁啟超更模仿德富蘇峰以一個人物寫出一個時代的敘史寫人之筆法。相關討論，詳見夏曉虹，〈「歐西文思」與「歐文直譯體」——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散文〉，收入氏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238-259。

47 關於梁啟超對於吉田松陰言行思想的接受情形，筆者主要參考郭連友，〈梁啟超與吉田松陰〉一文，收入氏著，《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172-199。此外，亦可參見張艷茹，〈過渡時代之英雄——梁啟超眼中的吉田松陰〉，《日本問題研究》2001 年第 2 期（北京），頁 49-52；石雲艷，〈吉田松陰政治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廣州），頁 100-107；袁一丹，〈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梁啟超對於西鄉隆盛與福澤諭吉之言行思想的理解與再書寫，同樣展現了「吸收－再生產」的過程。[48]早在〈記東俠〉裡，梁啟超便記述了西鄉與僧人月照兩人生死與共的情誼，二者相約一同蹈海自盡，但命運的作弄卻讓兩人生死永隔，這段傳奇故事成為尊王攘夷運動裡最為慷慨動人的詩篇之一。[49]相似的場景也出現在戊戌政變發生之後，維新士人命在旦夕時，梁啟超與譚嗣同（1865-1898）會面的情形：

> （譚嗣同）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共勉之。」遂相與一抱而別。[50]

譚嗣同願仿效月照殺身成仁，並期勉梁啟超如西鄉隆盛完成維新事業。在梁的筆下，最後更是將患難與共的友情、即將生死兩隔的悲慨，以及以身殉國的豪情膽氣，通通濃縮在「一抱而別」的定格畫面之中，讀之令人慷慨激昂、激動不已。但此一書寫，其實是梁的杜撰。[51]殉道者與流亡英雄的描寫，映照出動人的生命光彩，目的是為了理想化、崇高化維新運動，以「為國流血犧牲」的烈士形象來感召士人，取得人們的同情、支持與推崇，不難發現這樣的書寫明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次成功的書寫「再生產」。至於福澤諭吉，梁啟超雖然

啟超對於『善變』的解釋〉，《雲夢學刊》2008 年第 5 期（岳陽），頁 10-18。

48 至於中國知識人以及主張變法或革命者，對於西鄉隆盛之事蹟思想的接受及迴響，參見〔日〕中村義，〈中国近代史における西鄉隆盛像〉，《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 3 部門‧社會科學》39 期（1987，東京），頁 177-195；〈再論中国近代史に於ける西鄉隆盛像〉，《陽明學》9 期（1997，東京），頁 88-104。

49 梁啟超，〈記東俠〉，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頁 29-30。

50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頁 109。

51 根據論者研究，譚嗣同的〈獄中絕筆〉其實是梁啟超的偽作，後來梁氏在〈譚嗣同傳〉中，將其改寫為上述引文「月照西鄉」的內容。相關討論，詳見黃彰健，〈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曾經梁啟超改易〉，收入氏著，《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頁 531-5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沒有明白提到他閱讀、吸收其言行思想的途徑。[52]然而，從他對福澤諭吉事蹟的介紹，並將其視為明治維新的「偉人」與重要功臣，以及對其思想如「文明」、「自尊」、「獨立」、「公德」等觀點的汲引取用來看，梁啟超的確受到福澤諭吉很大的影響。[53]

上文一路從潘佩珠的閱讀經驗，討論到他與梁啟超的密切關係，以及梁啟超在東亞的知識流動渠道裡所扮演的角色。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潘佩珠能有其他的管道吸收新知新學，例如在潘佩珠的好友黃叔沆那一代的越南知識人之間所流通的《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盧梭和上述幾位維新人物已多次在書中登場，成為論述革新的思想資源，他們在書中的分量重要而顯目。[54]但對照潘佩珠的閱讀經驗，他並未將這本書納入閱讀清單，即使他曾經閱讀過，所受到的影響也不如梁啟超所給予的來得大。

簡而言之，對於初到日本、不諳日文又昧於情勢的潘佩珠來說，梁啟超不僅是心中仰慕的偶像，更是知識傳遞的導師。潘佩珠對於西學及

52 這一點使得研究者不容易了解福澤諭吉是如何進入梁啟超的知識視野，並成為日後之思想資源的途徑與情形。或許原因之一即如夏曉虹所指出的：「福澤諭吉以通俗文體寫作，對梁啟超來說，閱讀難度較大。因為對於日本人越容易懂得的文章，越難運用『和文漢讀法』。從梁啟超的譯介看，他讀的主要還是有濃厚漢文影響的日文著作，如中村正真、矢野文雄、柴四朗、德富蘇峰等人的書。」因此，論者較少討論梁啟超接受吸收福澤言行及思想的過程與狀況，而多集中在比較兩人思想上的異同。上述引文，見夏曉虹，〈借途日本，學習西方——梁啟超與明治文化〉，《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 183。

53 相關討論詳見區建英，〈中国における福沢諭吉理解——清末期を中心に〉，《日本歷史》525 號（1992，東京），頁 63-80；〔日〕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收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頁 95-119；蕭朗，〈福沢諭吉と梁啓超——近代日本と中国の思想・文化交流史の一側面〉，《日本歷史》576 號（1996，東京），頁 67-82；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 44-82。

54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一書為羅普（羅孝高，1876-1949）翻譯自高山樗牛（1871-1902）、姉崎正治（1873-1949）等人所著的《日本明治三十年》（1897），於 1902 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筆者所見為古同資譯，上海華通書局印行本（1931），然此書實翻印自 1902 年廣智書局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學的認識與理解，大都來自於梁啟超的翻譯轉介，或是得自於梁啟超用以建立自身知識儲備，且東亞知識人亦可同享共用的思想資源與精神食糧。因此，梁啟超對於西學東學的閱讀、接受與傳播之過程與情形，正提供了可資借鑑思考的典型。相信有不少東亞知識人如潘佩珠，亦是踏著相同的步伐，跟隨他的足跡來認識西方及日本，進而取資於此，加以應用變通，構築自身知識與思維系統。[55]下文則進一步探討，潘佩珠筆下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面貌，觀察其「再生產」書寫的情形，及其與東亞知識圈的互動。

三、知識再生產：潘佩珠對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反饋

接下來，筆者將討論潘佩珠如何將其吸收所得，轉化為著書立說的資源，以及他如何透過「再生產」的方式回饋給東亞諸國的具體情形。潘佩珠抱著向日本求援的期待抵達日本，但梁啟超並不支持越南向日本尋求軍事支援，因為「日兵入境，決無能驅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國而反促其亡也」。（《潘佩珠年表》）梁啟超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不在於向外求援，而是向內凝聚民氣、開啟民智及培養人才，這樣才能為日後的獨立厚植實力。然而，到外國遊學除了要有人才之外，也需要經費支持。因此，潘佩珠聽從梁氏的建議，於 1905 年 9 月撰成〈勸國人助資遊學文〉，文中提到潘佩珠希望越南青年到日本遊學的原因：

> 日本之所以為日本者，亦相信相恤、同死同生之一說也而已。昧昧思之，忽為我同胞大慟，忽為我同胞痛恨欲絕。既而，究日本維新

55 如韓國重要的民族運動者、歷史學者申采浩（1880-1936）在民族主義、演化論、愛國史觀上便受到梁啟超深刻的影響，詳見〔韓〕慎鏞廈，〈舊韓末申采浩的思想與梁啟超的著書〉，《韓國學報》第 10 期（1991，臺北），頁 169-176。此文承蒙審查人提醒，謹致謝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歷史，閱現時之照相、觀過渡之風帆，溯其博遊外洋、大搜學海，鑿開民智、培養人才，成此蕩蕩煌煌之偉業，則唱之者其初一吉田松陰者，而後有數千萬吉田松陰撫聲喝采，以固其聲而烈其響耳。我國之為吉田松陰者，豈獨少哉，則又為我同胞喜，則又為我同胞踴躍忘死。[56]

潘佩珠認為日本維新之所以成功，在於肯「開眼看世界」，接收各方新思想的刺激。而提倡遊學以作為培植人才的基礎，乃重要的方法之一。經過明治維新的努力，日本臻於富國強兵的境地，其中首要的提倡者便是吉田松陰。年輕的吉田松陰即有寬闊的視野，想要搭上美國艦艇，到國外汲取西學，卻沒想到被美艦艦長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送回，向幕府自首後遭到軟禁。吉田松陰雖然失敗了，但他的決心與至誠感動了幕末志士，成為打開鎖國與啟動維新的鑰匙。[57]潘佩珠受到梁啟超的影響，也認為吉田實居維新首功，[58]所以他又說：「吉田松陰第一維新之事業，我同胞諸兄弟，豈獨讓步哉。如不能然，或甘心於仇人，或延頸於外國。我不自立，誰非我仇。」[59]潘佩珠希望透過吉田松陰的事蹟，來激發國人效法學習之心，不讓吉田專美於前，

---

56 潘佩珠，〈勸國人助資遊學文〉，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500-504，上述引文見頁 500-501、503。

57 詳見〔日〕山口宗之著，馬安東譯，《吉田松陰》（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41-47。

58 梁啟超《自由書．成敗》云：「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為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后，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為天下耳，非為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此亦可見梁氏對於吉田松陰的仰慕。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頁 2-3。

59 潘佩珠，〈勸國人助資遊學文〉，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5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極力鼓吹國人積極捐資以助遊學。如此一來，人人都是吉田松陰，越南豈有不富強的道理。潘佩珠從吉田松陰的生命裡，找到立論言說以及支持行動的力量，也自許為倡導遊學、培育人才的越南吉田松陰。

潘佩珠在《越南國史考》中也提到學習西方新學新知的重要，他再次以日本維新之成功為例：

> 日未維新以前，歐美列強注視限於三島。當時勤王志士頑固頗多，專主鎖港之說，賴吉田松陰、福澤諭吉、後藤象次郎諸賢，大聲疾呼首唱洋學，謂排洋為失策，謂開港為適時，於是新學大興，新知識大進，釀成維新之基，至今富強凌駕歐美。諸者不以開港罪幕府，反以開港功幕府，則日本之民智為之也。[60]

自 1853 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迫使日本開港之後，俄、荷、英、法亦紛紛要求開港，日本內部幕府與諸藩之間，經歷一段開港開國與否的爭論。然而，最後促使維新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放棄鎖國，開放港口與各國通商往來，並大力吸收西方新學新知。除吉田松陰等人之外，明治維新中提倡學習西方最力的人便是福澤諭吉，他著有《文明論之概略》等著作，主張輸入西方文明，影響明治維新甚大。因此，梁啟超盛讚「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澤者十而六七也」。[61]潘佩珠希望國內士人志士不要再抱持著排外的封閉思想，昧於世界局勢的發展，故以福澤等人為例，說明開放與吸收新知對於維新的重要。[62]

---

60 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3 冊，頁 511。

61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114。

62 永聘認為相較於福澤諭吉提倡國民應培養獨立自主和科學精神以維持國家的獨立，潘佩珠則主張使用「暴動」的方法，達到獨立的目的。見 Vĩnh Sính, “Phan Bội Châu and Fukuzawa Yukichi: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Dông-Du Movement*, pp. 126-128. 永聘這樣的觀察雖大致描繪出兩人思想上的差異，卻忽略了他們面對不同的國家處境，也因此有不同的因應之道。而且潘佩珠在暴動主張之外，其實也注意到吸收新知、開啟民智、培育人才的重要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潘佩珠刊登在《雲南雜誌》上的〈和淚貢言〉，[63]主要針對越南士人與知識分子而發，目的在於喚起士人的自覺。他抨擊法殖民政府藉舊有之科舉制度以籠絡士人，誘千萬士子入其彀中，實際上是「利用我讀書識字之人以滅我種」。而士人也不應該盲目追求科舉虛名，「當一生之走狗，銜媚異種之豺狼，所獲者不過殘骨賸肉耳！」所謂進士舉人秀才，正是「亡我國、滅我種之毒餌也」。[64]他認為真正的「士」是：

> 夫讀書明理者惟士，思想偉大者惟士，任重道遠者惟士。諸兄弟試博覽歐亞新書、偉大列傳，若噶蘇士、若盧梭、若吉田松陰、大隈重信，革新以造時勢，孰非士之力乎。兄弟乎！兄弟乎！有為者亦若是。[65]

潘佩珠在此提出「士」的理想形象，應該是有獨立思想、能肩負重任者，而非為法國殖民者所利用，坐擁虛銜而「吮癰舐痔」、「蠹國蝨民」之人。他提到當時士人的典範，如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Kossuth Lajos, 1802-1894）、法國思想家盧梭、日本倒幕志士維新先驅吉田松陰，和日本政界重要的決策人物大隈重信等人，他們都是梁啟超所謂「先時之人物」，[66]無不

63 潘佩珠，〈和淚貢言〉，1906 年 10 月撰成，原刊《雲南雜誌》第 4 號（1907 年 7 月）。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 719-722。章收據此編入《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510-515。

64 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511。

65 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512。

66 梁啟超對「先時之人物」與「應時之人物」的定義如下：「其為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為一身計，則與其為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為應時之人物；為社會計，則與其得十百應時之人物，無寧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睹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為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引文見《康南海先生傳》，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58。附帶一提，潘佩珠可能亦透過梁著《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而認識噶蘇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各個領域擔負起身為「士」的責任，展現「士」所應有的形象。這也是潘佩珠對越南士人的期待。他並將「士」分為德士、志士、毅士、哲士、策士、俠士、美術士及將略士等類，希望號召諸「士」一同抗法、救亡圖存。而他對士人的期許，也同樣表現在〈海外血書〉裡，他希望「我國人勉哉！我國人之為盧梭、福澤諭吉者勉哉！」知識分子應如盧梭、福澤諭吉為楷模，以覺民自任，勉力匡救世道、挽回人心，而擔起救焚拯溺、警醒國人之責。[67]

而西鄉隆盛在潘佩珠的心中則是個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1907 年 5 月，潘佩珠在東京出版了《崇拜佳人》一書，他說：

> 今日世界懸性命於英雄之腦筋。世界一日無英雄，則世界不能以一日存活。無華盛頓則美利堅死，無波、瑪等三傑則意大利死，無西鄉、木戶諸賢則日本死。英雄者，卵育世界之布帛菽粟也。[68]

在這一段序言裡，潘佩珠刻意突出英雄的作用與重要性，甚至將英雄視為孕育世界的原動力，他認為這些建國元勳或是開創新政局的英雄，是近代民族國家得以成功建立或轉型的重要因素。[69]而在潘佩珠的心裡，西鄉隆盛與木戶孝允等人足以與華盛頓比堪，[70]華盛頓恰是當時最流行

---

67 潘佩珠，〈海外血書〉，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33-434。此文亦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頁 700-713。

68 潘佩珠，《崇拜佳人》，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57。

69 關於潘佩珠如何透過建國英雄論述，鼓動民族意識、號召同胞投入民族運動的討論，詳見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頁 119-141。

70 潘佩珠曾在其所著的漢文小說《真將軍》裡，將華盛頓與東鄉平八郎（1848-1934）對舉。但由於潘佩珠未稱全名，僅簡稱「東鄉」，再加上越譯本將之譯為「Tây Hương Long Thịnh（西鄉隆盛）」（如章收所編 *Thơ Văn Phan Bội Châu*〔《潘佩珠詩文選》〕〔河內：文學出版社，1985〕，頁 67），使得不少越南學者如永聘與阮進力，以為潘佩珠混淆了東鄉平八郎與西鄉隆盛的事蹟。永聘甚至因此認為潘佩珠對日本僅有膚淺的理解（never went beyond a superficial level），詳見 Vĩnh Sính（永聘）, “Phan Bội Châu and Fukuzawa Yukichi（福澤諭吉）: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Đông-Du Movement*, pp. 118, 141-142 之註 18。而阮進力則認為潘佩珠雖然寫到了「東鄉」的事蹟，但指的卻是「西鄉隆盛」，見阮進力，“Phan Bội Châu Viết về Vác Nhà Lãnh Đạo Công Cuộc Duy Tân ở Nhật Bản: Yoshida Shoin và Saigo Takamori”（〈潘佩珠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革命書寫話語。[71]潘佩珠著《崇拜佳人》一書，其實是希望國人能崇拜、效法國內的抗法先烈與國外的建國英雄，激發種性、振興國魂，一同為越南的獨立建國而努力。

潘佩珠在擘畫越南發展藍圖的《新越南》（1907）一書中，提到他的六個願望：願國人有冒險進取之志膽、有相愛相信之精神、有步驟文明之思想、有實行愛國之事業、有實行公德之事業，以及有名譽利益之希望。[72]他繼續以華盛頓和西鄉隆盛為例，討論好名譽利益與否，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他說：

> 道德之說盛，而士諱言為名；英雄之風高，而人諱言為利。嗚呼！名利亦何傷於道德，亦何歉於英雄哉。恐未必知真好耳。有名在旦夕，而其論一定，即留莫大之污；有利在目前，而其局一移轉，罹無窮之禍。彼所謂名，非真名也。好真名者，名鳴而萬古無異義，若華盛頓、若西鄉隆盛亦何必不為名。美國都城重自由之價值，東京銅像標紀念之模型，彼二人名譽之希望乃於是滿足。願我國人人皆為名。……要而言之，有一日之名，有萬世之名，孰優？有一身

於日本維新事業領導者的書寫——吉田松陰與西鄉隆盛〉），收入氏著，《明治維新與越南》，頁 279-280。實際上，潘佩珠（署名「天賦」）發表在中國《兵事雜誌》上的《真將軍》原文為：「華盛頓與英人抗，不及十年，而談美洲者，必稱華盛頓；東鄉與俄人抗，僅一海戰，而遊日本者，必知東鄉。此二人若生於我國，吾恐其不能為真將軍也。有萬萬億億之華盛頓，而後一華盛頓之名成；有萬萬億億之東鄉，而後一東鄉之名顯。美洲，吾不知；日本，則吾已親歷其地矣。彼國民徇國如徇家，赴公難如饑兒之赴食，一東鄉不過萬萬億億東鄉之代表耳。於是東鄉居然為勝俄大將軍，華盛頓想亦當然耳。」（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從引文可知，潘佩珠很明確地知道日俄戰爭中大敗俄國的海軍將領為「東鄉平八郎」而非「西鄉隆盛」，顯見潘氏對兩人的事蹟是有清楚的認識。引文見《兵事雜誌》41 期（1917，杭州），頁 9。此文亦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7-40。

71 參見鄒振環，〈「革命表木」與晚清英雄系譜的重建——華盛頓和拿破侖傳記文獻的譯刊及其影響〉，《歷史文獻》9 輯（2005，上海），頁 393-425；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

72 詳見潘佩珠，《新越南》，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50-4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之利，有全國之利，孰大？名取其優者，赴萬死而不辭擲千金，而不惜以求此名譽之必售，是為真好名。利取其大者，國權爭之以鐵血，文明購之以身家，以求此益利之必集，是為真好利。我國人皆有名譽益利之希望，我越南何為不富且彊耶。[73]

潘佩珠針對越南當前的問題及民族性而提出六大願，他認為其中一項弊病，便是國人恥言爭取名聲利益，長久以來，並不積極爭取有益之名聲利益。如此一來，國勢不但封閉退縮，也失去了與世界文明國家競爭的先機。他認為名聲利益之爭取與競爭是國家進步的原動力，對於這種萬世之名、全國之利，全國同胞更應積極爭取，養成好爭名、好大利的民族性。因此，他又再次舉華盛頓與西鄉隆盛為例，證明求名求利並不損其英雄形象，反而為國家帶來真正的大名大利。

在「民智」問題的探討上，潘佩珠也以西鄉隆盛為例，他說：

> 法國、美國之共和，共和由民智而生也。日、英、德之立憲，立憲根民智而起來。日本傾幕後，天皇據政。俄起西南之變至，天皇親將，舉傾國之師，八月而始平。於是悟輿論之難遏，知民願之難拂，不得不因機而導之，乃頒立憲之詔，以明治二十年開國會。故西鄉隆盛之功不大於倒幕府，而大於爭民權也。憲政頒布之日，即為西鄉公起銅像，至今過者千萬人無不仰而崇之。嗚呼！民智之為功於民權矣哉。吾乃今而哀我國人之無民智也。[74]

西鄉隆盛對於尊王攘夷運動的貢獻，實無庸置疑。不過，潘佩珠認為西鄉隆盛對於明治維新而言，有著更大的歷史意義，即在於加速民智的開啟與民權的爭取。[75]雖說西鄉是尊王倒幕、維新改革的功臣，卻也是維

---

73 潘佩珠，《新越南》，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55-456。

74 潘佩珠，《越南國史考》，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3 冊，頁 511。

75 阮進力認為潘佩珠之所以引西鄉隆盛為例，是看重西鄉之軍事才能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的貢獻，見阮進力，“Phan Bội Châu Viết về Vác Nhà Lãnh Đạo Công Cuộc Duy Tân ở Nhật Bản：Yoshida Shoin và Saigo Takamori”（〈潘佩珠對於日本維新事業領導者的書寫——吉田松陰與西鄉隆盛〉），收入氏著，《明治維新與越南》，頁 276-278。實際上，阮氏未能見到潘佩珠在《越南國史考》以西鄉之死為例，強調民智與民權的重要。同時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護士族利益的守舊派，而其所提倡的「征韓」、「征臺」之論，更非抱持民權主義者所應有。[76]但西南戰爭標誌著新舊時代的更迭演替，武士階層消失，使得反對維新政府的士族無法再依靠武力，而改以言論宣傳，進一步促成了自由民權運動與議會的設置。換言之，西鄉之死改變了歷史的走向，有著重於泰山的歷史意義，此亦是潘佩珠著眼之處。[77]附帶一提，日本憲法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頒布，而非潘氏所說的明治二十年（1887）。亦是此年，日本政府於東京上野公園塑立西鄉隆盛的銅像，以紀念人們心中永遠的英雄。

除了上述作品之外，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也一同參與了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互動。雖然此書長期以來被誤認為梁啟超的作品，卻藉由梁啟超的名聲，以及二十世紀初期東亞各國編譯亡國史的熱潮，而在東亞漢文化知識圈裡獲得不少迴響，不僅在 1906-1908 年數年之間出現數種朝鮮譯本，並多次再版，甚至收錄在朝鮮小學教科書之中。[78]《越南亡國史》不僅分析越南亡國的原因與殖民者的壓迫，也凸顯東亞各個被殖民國的相似處境與連動關係，誠如梁啟超的觀察：

夫不見一年來之日本之所以待朝鮮耶！今戰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

解潘佩珠《真將軍》中之「東鄉平八郎」為「西鄉隆盛」，因此特別突出西鄉隆盛為「真將軍」的形象。

76 西鄉隆盛本人思想的複雜性，承蒙審查委員提醒，謹致謝忱。

77 明治時期法政大學的講師野村浩一的授課講義，後由蕭鴻鈞（1867-1935）、蕭仲祁（1873-1967）昆仲翻譯的《日本維新小史》提到：「西南戰役為維新後未曾有之大變，然非出於南洲（即西鄉隆盛）之真意也。……南洲死後，社會團結，全國風潮湧上，民智日開，其程度之陡進，勢力之遠大，基礎之牢固，較之南洲未死以前，殆十倍焉。其後朝旨褒嘉，於頒行憲法之日，除其賊名、復其位。迄今上野銅像、麑島墓門，香花供養、朝野崇拜，亦足以慰長逝者愛國之魂矣。」筆者推測潘佩珠在 1907 年撰寫《新越南》之前，可能讀過此書，以獲知日本維新的狀況，因此其對西鄉的描述與此書有雷同之處。上述引文見〔日〕野村浩一講述，蕭鴻鈞、蕭仲祁編校，《日本維新小史》（東京：清國留學會，1906），頁 30。

78 關於《越南亡國史》在朝鮮翻譯和出版之狀況，詳見鄒振環，〈梁啟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第 1 輯（2000，瀋陽），頁 308-3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之現象，已將見矣。同一日本而待臺灣與待朝鮮，何以異焉，其故可思也。越南且然，朝鮮且然，況乃其可畏什伯於越南、朝鮮者，又如何矣！[79]

越南亡國的歷史殷鑑，對於有類似遭遇的東亞諸國恰好形成一種共通性的殖民地體驗，各國在彼此的關聯呼應之中，得以促進自身民族意識的覺醒與凝聚，這正是潘佩珠《越南亡國史》對於近代東亞的歷史意義。[80]

四、是「調適」還是「轉化」：潘佩珠與梁啟超不同的思想趨向

以梁啟超、潘佩珠兩人對於西方思想家和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我們可以發現在多元繁複的文化市場裡，梁啟超是潘佩珠進出東亞知識流動渠道最主要的引領者，在潘佩珠所吸收與再生產的概念裡，有不少梁啟超所提供的思想資源。不過，潘佩珠並非只是單純轉販知識，進行知識的再生產而已。實際上，在梁、潘兩人所形成的知識之流裡，嵌合著中西日越等多方因素，並隨著兩人所面對之現實處境的差異，以及前後思維的變遷，呈現出不同的內涵與走向。

潘佩珠於 1905 年抵日，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歷思想的轉變，從激烈變革轉往漸進革新。透過研究者的細緻討論，發現梁啟超的思想由「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與「調適」（accommodative approach）兩種思維面向交織而成，雖然說梁氏前後期的思想主軸有別，但其思維由「轉化」走向「調適」，並非猛然突變，而是有著思想上的連續性與脈絡可

79 梁啟超，〈記越南亡人之言〉，《自由書》，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頁 110。

80 關於《越南亡國史》的著作權問題、傳播狀況，以及此書對於近代東亞反殖民運動的回饋與影響，詳見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頁 133-136，此不贅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尋。[81]處於世變之局，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正面臨著「轉化」與「調適」這兩種思想傾向的選擇，黃克武借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概念，說明這兩種思想傾向的差異：

> 近代中國的革命派傾向於「轉化類型」，主張以一套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以達到「拔本塞原」的目的，他們多以歷史有兩個階段，一為完全成功的將來或當代的歐美社會，一為徹底失敗的當代中國，而歷史上成功的例子，使他們樂觀地相信理想終將實現；改革派則傾向於所謂的「調適類型」，以為不可只看理想而不顧現實，因此他們主張小規模的局部調整或階段性的漸進革新，並反對不切實際的全面變革。[82]

這一組相互對照的觀念，除了可以用來檢視包含梁啟超在內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特色，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潘佩珠複雜的思維面貌及其轉變的歷程。

歷經思想前後期轉變的梁啟超，對於本文所聚焦的幾位西方思想家或是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也呈現出前後期的差異，在這裡我們以梁、潘兩人共同書寫的盧梭、瑪志尼及吉田松陰三人為例，來說明梁啟超前後期的看法。梁啟超早期對於盧梭本人及其思想推崇備至，「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唯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又認為《民約論》「可講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遍於大地」。[83]然而，梁啟超卻於 1906 年撰〈開

81 許多研究梁啟超的學者大都以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月梁氏訪美歸來，做為他思想轉變的分水嶺：前期由緩進而激進，甚至主張革命排滿；後期則由激進而緩和，趨向保守，提倡開明專制。詳見黃克武對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回顧，《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28-32。該書原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1994 年出版，作者於再版時雖未更動全文之結構、觀點，但增訂內容，並補充學界較新的研究成果，故筆者主要參考 2006 年修訂再版。

82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 6。

83 前引文見梁啟超，〈破壞主義〉（作於 1899 年），《自由書》，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頁 25。後引文見〈盧梭學案〉（作於 1901 年），收入林志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專制論〉一文，認為盧梭《民約論》並無實現的可能，只是盧梭等人的主觀理想而已。[84]又如梁啟超也曾高度讚揚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瑪志尼，並以瑪志尼自任，將自己的感情投注在瑪志尼身上。但在梁啟超的思想與心境發生轉變後，他改以加富爾（Camillo B. Cavour, 1810-1861）自許。[85]至於梁啟超對吉田松陰的書寫，也同樣經歷了從「打破局面」之「革命家」到具有崇高人格之維新先驅的轉變，不再激進。[86]正因為梁啟超的看法有前後期的差異，所以留在文化市場上供人汲引的思想資源，便有以「轉化」為主或是以「調適」為主的兩種面貌。當潘佩珠在

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110。梁啟超後於 1902 年作〈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高度評價盧梭及《民約論》云：「（《民約論》）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結約，以眾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眾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卷，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頁 112-113。

84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云：「夫使其內部本無此物，而欲強附益之，是斷鶴膝而續烏脛也；使其內部雖有此物，然未至發達之期，而強欲躐等而發達之，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彼盧梭民約之論，無論應用之於何國，而無不失敗者，以國家本無此物也，不過盧梭等數人主觀的理想，以為應有此種類之國家而已，而考諸歷史上，未之前聞也。故彼等欲以此精神改造國家，其立意就令極善，無奈與國家內部自身之構造，先相矛盾，終不可得而致也。」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頁 36。

85 關於梁啟超對於瑪志尼的推崇，以及日後的轉變，詳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81-83，尤其是註 76 之處。而日人松尾洋二則觀察到梁啟超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的第九小節與結論對三傑的不同評價，前者重視瑪志尼，後者則是對三傑一視同仁。松尾洋二認為：「相對來說，在小結部分裡，早期『新民說』的思想要素更濃厚一些，而總結部分，實際上已包含了後期『新民說』所要闡述的思想的雛形。可以說梁啟超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在其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所處地位就像是扇子上的軸點，而且是有兩個軸點。」詳見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頁 261-264，引文見頁 264。

86 郭連友認為：「以 1903 年 11 月為界，梁啟超此前一直強烈主張的『破壞主義』『革命家』的松陰觀逐漸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強調松陰在明治維新中的先驅者和原動力方面的因素。」見氏著，〈梁啓超與吉田松陰〉，頁 172-199，引文見頁 1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對梁啟超這兩種思想傾向時，他又是如何選擇取捨？

在觀察潘佩珠的思想選擇之前，我們應先了解潘佩珠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以及他渡日前後的政治主張。中越兩國同樣面臨西方殖民帝國的強勢挑戰，然中國尚能維持國家主權，越南卻已淪為法國殖民地。所以，越南士人或是民族運動者所要思考的問題，除了政體應為「君治」或是「民治」之外，還必須處理自身與殖民者的關係：究竟是要「倚法」還是「排法」？基於不同的關懷，他們對於如何進行越南民族運動的看法出現了分歧，其中又以潘佩珠與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 1872-1926）兩人為主，彼此的政治主張與行動步驟有極大的不同。潘佩珠曾在自傳中提到兩人觀點上的差異，他說：

> 自是一連十餘日（按：約於 1906 年 4 月），公（按：指潘周楨）與予反覆議論，意見極相左。公則欲翻倒君主，以為扶植民權之基礎；予則先摧法賊，俟我國獨立之後，及能言及其他。予所謀利用君主之意，公極反對；而公所謀尊民排君之意，予亦極不贊成。蓋公固與予同一目的，而手段不同。公則由倚法排君入手，予則由排法復越入手，此其所異也。（《潘佩珠年表》）

有別於潘佩珠試圖運用君主的號召力來進行越南獨立運動，潘周楨則主張應先革除君主體制，以扶植民權，當民智民權獲得穩固的發展時，越南不患無獨立之日。因此，潘周楨對於潘佩珠「擁君排法」、「建立君主立憲」的主張多所批評，他認為「不必倡言排法，只當提倡民權，民知有權，則其他皆可徐圖也」。[87]如此看來，主張擁立君主、提倡君治的潘佩珠似乎是延續舊體制的守舊派，而極力抨擊君主專制、強調民權民主的潘周楨宛如開創新局的激進派。換言之，前者傾向「調適」思想，後者趨向「轉化」思維。

然而，在法國所建立的殖民統治體系之下，越南朝廷早已形同虛設，成為法人控制殖民地的傀儡。因此，就越南遭受殖民者侵略的現實處境

87 語出《潘佩珠年表》，同書也提到潘周楨「每談國家，必痛詆獨夫民賊之罪惡，而尤切齒於現時君主之禍國殃民，自以為君主不廢除，則雖復國，亦非幸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看，如何面對殖民者所建立的體制，才是進行民族運動、追求國家獨立更為迫切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潘佩珠也提到兩人分歧的理念為實際的民族運動所帶來的困擾：

> 先是予與小羅（按：阮誠，Nguyễn Thành, 1863-1911）擁畿外侯，本欲利用君主以迎合一般人心，其真目的在驅逐法政府耳。因此名義，所以予出洋後，附和頗多。自西湖公由日本歸來，大唱尊民排君之說，專攻擊君主，而置法政府不問，創為倚法求進步之政策。一時輿論忽然紛紜，幾起黨爭之禍。（《潘佩珠年表》）

就兩人的實際措施來看，潘佩珠繼承過去越南士人武裝抗法的傳統，在殖民體制外採取激烈的暴動革命，強調軍事人才的培育，並向日本請求外交和軍事上的援助。而潘周楨則是希望透過法國殖民體制內的改革，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推翻阮朝君主的專制統治，因此他反對潘佩珠的激進行動與向外求援的策略。[88]兩人的論爭實為近代越南民族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就連當時的中國報刊也有相關報導，刊載一位署名「坦昂特」的越南文士對於潘佩珠、潘周楨之論爭的看法：

> 近聞我留學界有希亞氏，某日在東京旅館，與修星氏酒酣耳熱，抵掌而談，各持己見，舌戰不休，頗饒趣味。希氏之言曰：「嗚呼！我國亡矣，我輩長為奴隸矣。丈夫死耳，孰堪斯辱哉。猛赴前途，達吾希望，縱與殘酷法人鐵血激爭，亦所弗恤。」星氏駁之曰：「君何昧於時勢耶！安南之國力若何，人民之程度若何，獨立之機，至今猶未熟也。吾寧服從於法國指揮之下，忍辱待時耳。」……嗚呼！主權已亡，苟延日月。凡有血性之國民，寢寐間當不忘獨立之語，

88 關於潘佩珠與潘周楨兩人在思想上的歧見，參見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第七章第一節「ファン・チュ・チン（即潘周楨）との論争——政体問題をめぐって」，頁 249-259。梁志明，〈潘佩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257-273。〔越〕吳雪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越南進步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4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然則希氏慷慨悲涼，寧為義死，不為苟存是也。然明智之士，惟在知機，欲戰則無軍費可籌，欲抗則又民心渙漫。貪一時之快意，擲有用之頭顱，如妾婢牧豎，計無所之，而自甘溝壑，豈有濟耶！由是言之，星氏所言，亦未可厚非也。……余嘗潛心研究中國日本所發行之新聞雜誌，洞察機宜。我國民所當努力者，非激論，亦非戰爭。靜考日本勃興之淵源，漸養國民團結之思想，且接近法國，易採西歐文物之精神，熱心實行，庶有效乎！[89]

這位越南文士「坦昂特」的真實身分目前無從知悉，而文中的「希亞」與「修星」則分別暗指潘佩珠、潘周楨兩人。這篇短文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藉由兩人的爭辯，扼要地概括兩人在政見上的不同。這場爭辯濃縮了前文所述，二潘一連長達十餘日之論辯的內容。潘佩珠認為應採取激烈排法的做法，而潘周楨則抱持著倚法緩進的主張。其次，是為潘周楨辯解，作者認為被殖民者應當爭取獨立，但在各種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武裝暴動只是暴虎憑河、徒增犧牲而已，因此不應深責潘周楨倚法待時之策。最後，則是作者提出自己的見解，但顯然他是支持潘周楨倚法漸進之理念。因此，若從思考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關係的層次來看，潘佩珠反而傾向「轉化」思想，而潘周楨則趨於「調適」思維。

帶著這樣的理解，我們進一步思考潘佩珠對梁啟超思想言論的選擇狀況，可以發現渡日時期的潘佩珠雖然主張君主立憲，在政體的選擇上與梁啟超有較為相近的理念，而且此時梁氏的思想也已經趨於溫和緩進，但潘佩珠在對相關人物的書寫上，卻選擇了梁啟超前期高唱革命與破壞，激進排滿的思想言論。例如潘佩珠初到日本，極為仰慕〈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中的瑪志尼，心醉於「教育與暴動並行」一語，在宣傳之外，更專注於「運動軍事，籌備武裝實行之舉動」。又如潘佩珠總認為盧梭與吉田松陰等人是越南士人的楷模，期許知識分子以他們自任，所謂「革新以造時勢」，以「鳴我自己鐘、樹我獨立幟」。[90]可見潘佩珠

89 〔越〕坦昂特，〈越南遺民之意見書〉，《競業旬報》22 期（1908，上海），頁 57-59。
90 潘佩珠，〈海外血書〉，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筆下的人物形象，並非梁啟超思想轉型之後所書寫的人物面貌。思維「流質易變」的梁啟超，[91]曾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92]然而，此時潘佩珠看重的卻是梁啟超「昔日之我」的言論，而這激昂的思想言論也正是梁啟超風靡世人之處。

潘佩珠對於西方思想家和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選擇接受了梁啟超的前期言論，與此相對照，在潘佩珠不少政論文章裡，也可以看到梁啟超前期較激進思想的影子，例如在〈和淚貢言〉裡借用了梁氏〈英雄與時勢〉、〈過渡時代論〉裡的「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來強調英雄在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如〈勸國民助資遊學文〉、《越南國史考》裡強調的「合群」，〈海外血書〉中認為君主是「一里之長，一公司之總理員」，[93]以及《新越南》裡的「冒險進取」、「實行公德」等概念，都可以見到梁啟超《新民說》前期思想的蹤跡。但這不意味潘佩珠只擇取梁啟超前期較為激進的思想而已，1907 年初潘佩珠在欲緩和他與潘周楨之論爭的〈寄潘西湖先生書〉中，便曾轉用梁啟超於 1906 年所撰〈開明專制論〉裡提出中國因國民程度幼稚，應該實行開明專制的看法。潘佩珠則認為君主制比較適合越南人民的幼稚程度，反而難以實行潘周楨的民主之說。[94]值得注意的是，潘佩珠將他與潘周楨的歧見分別看作是「實

91 康有為，〈與任弟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十三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299。

92 梁啟超接著提到言論前後不一的缺點是「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清代學術概論》，頁 63。

93 潘佩珠，〈海外血書〉，收入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 2 冊，頁 417。

94 梁啟超以為「人民程度未及格」（文中多稱其「幼稚」）與「施政機關未整備」是中國尚未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原因，既然連君憲制都沒辦法實行了，更是「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開明專制論》，頁 77-83。潘佩珠認為：「我國民今日正當幼稚者，其猶胚胎乎！齒未堅而飼之以骨，足未踵而策之以鞭，其不吞而彊走而僵者，無是理也。我國民之程度不及歐洲亦遠矣。跛聾殘疾之病夫，又重以飢困，謀食謀衣，日不暇給。呼號而醒之，使之起者，惟有此厭苛思舊之一日。」見〈寄潘西湖先生書〉，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潘佩珠年表》書後附錄，編號 Vhc. 2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與「理論」兩種不同層面的問題：

> 大抵理論之與實行，須有斤兩。方今之日，貴乎實行。苟可以行我救國之方針，不妨姑秘其警時之高論。俟十年後，大兄再伸前說，則其立兄旁而撫掌喝采者必弟也。（〈寄潘西湖先生書〉）

潘佩珠認為以現今越南的情勢，應該先放下屬於「理論」層面的民主之說，而採取「實行」層面的君主制。潘佩珠這樣的看法不無矛盾之處，因為無論是採取「君主」還是「民主」，都是一種理念上的選擇，何以「君主」便是「實行」，而「民主」則為「理論」。而且，潘佩珠也並未真正否定民主，他告訴潘周楨，目前應該先基於情勢的考量，暫時支持君主政體。日人白石昌也曾經敏銳地指出潘佩珠〈寄潘西湖先生書〉欠缺積極的理論依據，且有不少缺陷與矛盾。[95]而信中另一處值得對照之處，是潘佩珠對盧梭與孟德斯鳩的書寫，他說：

> 自惟數十年前，沈沒於濁洋奴隸之波，饜飫於腐儒君臣之說，豈知孟德斯鳩、盧梭為何物。（〈寄潘西湖先生書〉）

潘佩珠主張君主政體，卻在信中批評君主專制，讓國人無法得知盧梭與孟德斯鳩的學說。潘佩珠雖汲引梁啟超〈開明專制論〉中國民程度低落的看法，卻未如梁啟超的調適思想，認為盧梭思想已無實現的可能，而加以抑止，反而在與君主專制的對比中，突顯了盧梭與孟德斯鳩所代表的意義。由此可見，潘佩珠對於梁啟超之思想言論的選擇，實有自身對於現實民族運動情勢的考量。

從潘佩珠與潘周楨的論爭裡，我們可以看到潘佩珠對於君主體制的支持並不徹底，甚至出現與君主體制相互矛盾的言論，立場已有所鬆動。

---

95 例如潘佩珠要求潘周楨放下立場，卻強調他自己的主張。其次，潘佩珠嚴加區別當前的運動方針與未來的展望，忽略民族運動的連貫性。再次，潘佩珠認為應迎合國民的低程度，支持君憲制，但平時卻訴求高揚民智民氣。最後，潘佩珠擁護君主，但對於君主（阮朝皇帝與順化朝廷）未有一致的評價。因此，潘佩珠的說法實在難以說服潘周楨。詳見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第七章第二節「『民主の思想』への傾斜」，頁 268-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研究者也從潘佩珠 1907 年之後的作品裡，觀察到他對於君主體制的批評，並逐步往民主思想傾斜。[96]實際上，潘佩珠自己也覺察到其思想的轉變，他說：

> 予自到日本後，歷究外國革命原因及政體之優劣，又心醉於盧梭、孟德斯鳩等理論。……且多與中華同志結合，君主主義已置腦後。所以未敢倡言者，因予出發時，以君主旗幟取信於人，設使局面尚存，則手段未敢更改。今則局面已大變矣，予乃突然於眾中，提出民主主義之議案。（《潘佩珠年表》）

在 1907 年年中，潘佩珠其實就有「更弦易轍」的念頭。[97]當時潘佩珠雖然打著「擁君」的旗號，但「排法」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因此，即使他與梁啟超在政體的選擇上有相似的看法，但為了實際運動的需要，他對梁啟超之思想言論的選擇汲引，主要還是傾向於梁氏前期高唱革命與破壞的言論，以鼓動人心、爭取支持，揭發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以引起外界的輿論並爭取奧援。潘佩珠本身就有與後期之梁啟超不同的思想趨向，但此思想趨向卻又受到自身支持君主政體的影響，因此在激進之中又帶有保守的色彩，而呈現出錯綜複雜的面貌。隨著自身思維的發展、實際運動的進行、對相關學說的認識與理解，以及與中國革命黨人的往來（這也意味著潘佩珠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讓他有了揚棄君主政體的想法，雖受限於原本的計畫與組織，使他沒有辦法立即改變運動方針，但民主思想卻已在心中滋長。日後，潘佩珠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正式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綱，他的「轉化」思想也就顯得更為純粹、更為激烈了。[98]

---

96 見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頁 259-272。

97 潘佩珠亦於 1907 年 7-8 月間提到：「予因多與中國革命黨人相周旋，民主之思想已日益濃厚。雖阻於原有之計畫，未能大肆其詞，然胸中含有一番更弦易轍之動機。」（《潘佩珠年表》）

98 1912 年夏秋之間，潘佩珠試圖成立革命軍隊，他說：「時予鑒於宣傳政策之徒費空言，與和平緩進之徒勞夢想，即如東渡遊學畫虎不成，義塾義商作繭自縛。宣傳緩進等套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語

本文聚焦於潘佩珠東渡日本前後的觀念及思維的形成過程，以及梁啟超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力，來觀察從梁啟超到潘佩珠，某些「概念」的轉移變遷，以窺見東亞知識圈所歷經的流動與互動之樣態。從潘佩珠的閱讀經驗，到他與梁啟超的密切關係，以及梁啟超在東亞的知識流動渠道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發現，對於初到日本、不諳日文又昧於情勢的潘佩珠來說，梁啟超不僅是心中仰慕的偶像，更是知識傳遞的導師。潘佩珠對於西學及東學的認識與理解，大都來自於梁啟超的翻譯轉介，或是得自於梁啟超用以建立自身知識儲備，且東亞知識人亦可同享共用的「思想資源」與「精神食糧」。換言之，梁啟超成為潘佩珠在日初期重要的思想資源的供應者，影響他的知識建構與形成。而值得注意的是，潘佩珠的作品也同樣是東亞知識人在進行改良或是革命論述時所取資的對象，這從《越南亡國史》和其他作品與近代東亞的互動便可見一斑。

潘佩珠將其吸收之所得，轉而著書立說，他筆下的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實際上也經歷了一段「再生產」的知識旅程。透過潘佩珠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以及他與越南另一位重要的民族運動領袖潘周楨的比較，可以發現渡日時期的潘佩珠雖然主張君主立憲政體，在政體的選擇上與梁啟超有較為相近的理念，但潘佩珠在對相關人物的書寫上，卻選擇了梁啟超前期高唱革命與破壞、激進排滿的思想言論，與當時緩進時期的梁啟超在思想上已有不同的取向。即使潘佩珠引用了梁啟超〈開明專制論〉裡的觀點，來支持君主政體，但在同一篇文章裡卻同時出現否定君主專制的言論，顯示其思想已蘊含轉變的因子。日後，則隨著自身對於現實民族運動情勢的種種考量，而走上一條與梁啟超調適思想差

已視為不入耳之談，晝作夜思，惟求得武裝革命之實現，與暴動革命之實施。」（《潘佩珠年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更大的道路。

由此可見，由潘佩珠與梁啟超所連結而成的知識旅程，實經歷了由西到東，從歐美與日本再到中國與越南的過程，吸納融混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隨著現實處境的轉換更迭及前後思維的變遷，而呈現出不同的內涵與走向。這證明了東亞知識人與近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以及文化思潮的多方交會，在區域內呈現出複雜多元的互動關聯。

實際上，學界對於東亞文化圈中知識流動之具體情形的研究——即關於東亞知識人如何吸收、轉化、重組及再生產知識，尚有足資開發的空間。我們可以透過他們著作中所顯露的訊息或是蛛絲馬跡，來觀察、探索東亞知識人的知識建構與重構情形。本文即是透過潘佩珠的作品，觀察他對於這些新思想新思潮之吸收、理解與再生產，進而思考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互動狀況。相信這個由梁啟超與潘佩珠所形成的「知識之流」，可以做為東亞知識人進出東亞知識渠道，以及東亞知識圈流動與互動的典型例證。

*本文初稿曾以〈論潘佩珠對新知新學的吸收、理解與再生產——以西方思想家及日本維新人物為例〉為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東亞的思想與文化——以越南為核心」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感謝評論人文哲所研究員廖肇亨先生熱情且詳盡的指正與建議。復蒙《臺大歷史學報》三位審查委員惠賜意見，針對本文之論點、結構，以及研究方法提出中肯剴切的建議。諸位評論人所開啟的諸多思考，對筆者而言，不啻為一次收穫豐富的知識旅程，在此謹致謝忱。未逮之處，文責自負。同時感謝紀昭君小姐修正本文英文摘要。而筆者在數次校閱之中，益感《臺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的嚴謹周密、謹慎細心，在此一併致謝。

（責任編輯：蘇聖雄　校對：蘇婉婷　劉昱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郅志選注，《猛回頭——陳天華、鄒容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孫　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
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清〕嚴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日〕野村浩一講述，蕭鴻鈞、蕭仲祁編校，《日本維新小史》。東京：清國留學會，1906。
〔越〕坦昂特，〈越南遺民之意見書〉，《競業旬報》22 期，1908，上海。
〔越〕章收編，*Thơ Văn Phan Bội Châu*（《潘佩珠詩文選》）。河內：文學出版社，1985。
〔越〕章收編，*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潘佩珠全集》）。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
〔越〕新書院編，《新書院守冊》。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2645，阮朝維新八年（1914）抄本。
〔越〕聚奎書院重編，《聚奎書院總目冊》。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A. 111，阮朝成泰十四年（1902）抄本。
〔越〕潘佩珠，〈和淚貢言〉，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越〕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編號 Vhc. 2138。

二、近人著作

（一）專書

李　瑋，《盧梭》。臺北：婦女與生活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沈殿成，《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1896-1996》。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侯鴻勳，《孟德斯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
袁　賀、談火生選編，《百年盧梭——盧梭在中國》。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畢小輝，《中江兆民》。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明龍，《孟德斯鳩與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
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盧梭著，馬君武譯，《盧騷民約論》。臺灣：中華書局，1984。
〔日〕山口宗之著，馬安東譯，《吉田松陰》。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日〕飛鳥井雅道，《中江兆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北京：三聯書局，1983。
〔越〕丁春林等主編，*Tân Thư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Cuối Thế Kỷ XIX Đầu Thế Kỷ XX*（《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1997。
〔越〕阮進力，*Minh Trị Duy Tân và Việt Nam*（《明治維新與越南》）。胡志明市：越南教育出版社，2010。
〔越〕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Quan Hệ Văn Hoá,Giáo Dục Việt Nam-Nhật Bản và 100 Năm Phong Trào Đông Du*（《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6。
Marr, David G.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二）論文

王先明，〈近代「新學」形成的歷史軌跡與時代特徵〉，《天津社會科學》2002 年第 1 期，天津，頁 118-124。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王憲明、舒文，〈近代中國人對盧梭的解釋〉，《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北京，頁 16-33。
司馬長風，〈梁啟超的「新民運動」〉（上）、（下），《南北極》112-113 期，1979，香港，頁 71-75、52-55。
石雲艷，〈吉田松陰政治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廣州，頁 100-107。
吳雅凌，〈盧梭思想東漸要事匯編〉，《現代哲學》2005 年第 3 期，廣州，頁 39-43、57。
吳雅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漢譯及其影響〉，《現代哲學》2009 年第 3 期，廣州，頁 84-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周佳榮，〈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近代中越關係史上的一段插曲〉，收入氏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

夏良才，〈《民約論》在中國的傳播〉、〈孫中山、梁啟超和《民約論》〉，皆收入黃德偉編，《盧梭在中國》。香港：香港大學，1997。

夏曉虹，〈從《尚友錄》到《名人傳略》——晚清世界人名辭典研究〉，收入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下），《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 年第 3 期，廣州，頁 35-43 轉 34。

徐善福，〈關於《越南亡國史》的作者問題〉，《東南亞縱橫》1992 年第 3 期，南寧，頁 35-37。

袁一丹，〈梁啟超對於『善變』的解釋〉，《雲夢學刊》2008 年第 5 期，岳陽，頁 10-18。

區建英，〈中国における福沢諭吉理解——清末期を中心に〉，《日本歷史》525 號，1992，東京，頁 63-80。

郭連友，〈梁啟超與吉田松陰〉，收入氏著，《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張艷茹，〈過渡時代之英雄——梁啟超眼中的吉田松陰〉，《日本問題研究》2001 年第 2 期，北京，頁 49-52。

梁志明，〈潘佩珠與潘周楨比較研究〉，收入氏著，《東南亞歷史文化與現代化》。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漢學研究學刊》1 期，2010，吉隆坡，頁 119-141。

陳慶浩，〈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2007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7。

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0 期，1997，臺北，頁 101-148。

黃彰健，〈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曾經梁啟超改易〉，收入氏著，《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黃國安，〈《越南亡國史》是梁啟超撰寫嗎？〉，《東南亞縱橫》，1991 年第 1 期，南寧，頁 36-38。

鄒振環，〈「革命表木」與晚清英雄系譜的重建——華盛頓和拿破侖傳記文獻的譯刊及其影響〉，《歷史文獻》9 輯，2005，上海，頁 393-425。

鄒振環，〈梁啟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第 1 輯，2000，瀋陽，頁 308-318。

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韓國研究論叢》第 2 輯，1996，上海，頁 325-354。

鄭永福，〈盧梭民權學說與晚清思想界〉，《中州學刊》1985 年第 4 期，鄭州，頁 110-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蕭 朗，〈福沢諭吉と梁啓超——近代日本と中国の思想・文化交流史の一側面〉，《日本歷史》576 號，1996，東京，頁 67-82。

顏德如，〈理解的可能，《盧梭學案》與《社會契約論》之比較〉，收入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譚汝謙，〈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收入〔日〕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日〕川本邦衛，"Tác Phẩm Thời Kỳ Đầu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à Lương Khải Siêu và Một Vài Vấn Đề Về Phong Trào Đông Du"（〈潘佩珠的早期作品與梁啟超以及一些東遊運動的問題〉），收入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6。

〔日〕川尻文彥，〈清末中國接受《社會契約論》之諸相〉，收入〔韓〕崔博光主編，《東北亞近代文化交流關係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

〔日〕中村義，〈中国近代史における西郷隆盛像〉，《東京學藝大學紀要・第 3 部門・社會科學》39 期，1987，東京，頁 177-195。

〔日〕中村義，〈再論中国近代史に於ける西郷隆盛像〉，《陽明學》9 期，1997，東京，頁 88-104。

〔日〕今井昭夫，"Thời Kỳ Hoạt Động ở Nhật và Hình Thành 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潘佩珠在日活動及其思想形成過程〉），收入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6。

〔日〕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收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日〕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收入〔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日〕宮村治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學」との關聯において〉，收入氏著，《開国経験の思想史：兆民と時代精神》。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日〕狹間直樹撰，張玉林譯，〈梁啟超研究與「日本」〉，《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4 期，1997，臺北，頁 44-53。

〔日〕飯島幸夫，〈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契約論』の翻訳について〉，2005 年 9 月，網址：http://www15.ocn.ne.jp/~iijima/discours/newpage6.html（2010 年 9 月 9 日讀取）。

〔法〕瑪麗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辛亥革命前盧梭對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收入劉宗緒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

〔越〕吳雪蘭，〈潘佩珠與梁啟超及孫中山的關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6 期，北京，頁 135-141。

〔越〕吳雪蘭，〈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越南進步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越〕Vĩnh Sính（永聘）, "Phan Bội Châu and Fukuzawa Yukichi（福澤諭吉）: Perceptions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Dông-Du Movement.* Edited by Vĩnh Sính. New Have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88.

〔越〕范鴻崧，"Về Các Cuộc Gặp Gỡ giữa Phan Bội Châu và Lương Khải Siêu và Sự Khởi Phát của Phong Trào Đông Du"（〈關於潘佩珠與梁啟超的會晤，以及對東遊運動的啟發〉），收入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主編，《越日教育、文化之關係與東遊運動一百年》。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6。

〔越〕楊庭立，"Chủ Trương'Bạo Động'của Phan Bội Châu trong Phong Trào Yêu Nước Đấu Tranh Chống Pháp"（〈在抗法鬥爭愛國運動之中，潘佩珠的「暴動」主張〉），收入河內國家大學、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編，*Phan Bội Châu: Con Người và Sự Nghiệp*（《潘佩珠其人及其事業》）。河內：河內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1998。

〔韓〕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識在東亞的傳播及其共同文本之探索〉，收入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韓〕愼鏞廈，〈舊韓末申采浩的思想與梁啟超的著書〉，《韓國學報》10 期，1991，臺北，頁 167-176。

Duiker, William J. "Phan Boi Cha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 1971, Ann Arbor, pp. 77-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8 (Dec. 2011), pp.51-96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ransfer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of East Asian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Sphe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hinkers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tellectuals by Liang Qi Chao and Phan Bội Châu

Luo, Ching-wen*

Abstract

It's interesting though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the East Asian intellectuals construct their own knowledge system in multiple ways. Firs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wo important East Asian intellectuals－Liang Qi Chao (梁啟超, Chinese) and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Vietnamese)－ and considers their descriptions of Western thinkers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tellectuals. By discussing the transition, recombin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me conceptions by Liang Qi Chao and Phan Boi Chau, respectively, we will have a much clearer picture of knowledge transfer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of East Asian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sphere. Second, by examining during this specific intellectual journey, this essay shows the greatness of their knowledge systems in which illustrates the interaction of knowledge－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or from the Occident and Japan to China and Vietnam. Furthermore, they exhibit corresponding traits in step with the actual, changeable environment. On this basis, we can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and modern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East Asia area.

Keywords: East Asia,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 Liang Qi Chao (梁啟超),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reproduction.

---

* Ph.D. Candidate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No.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City 70101, Taiwan; E-mail: jiingwen123@pchome.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